

北海银行在山东根据地的金融斗争

□ 王成娟

1938 年秋，北海银行在山东根据地的掖县应运而生，在之后的 10 余年间，它从小到大、由农村到城市，在战火中开展金融斗争，探索了一套符合客观实际的金融体系，最终发展壮大为中国人民银行三大奠基行之一，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红色金融的杰出代表。

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深刻影响了山东的经济版图，金融市场十分混乱。日军在齐鲁大地长驱直入，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联银券”肆意充斥市场，并逐步建立了遍布山东的金融控制网络。大批地方势力、奸商巨富乘机滥发票券，以“纸”易“财”，土杂钞横行。种种乱象给根据地建设、军队供给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困难，物价飞涨，“一麻袋票子还换不到一麻袋粮食”，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1938 年初，中共掖县县委毅然举行玉皇顶抗日武装起义，创建了山东省第一个县级民主政权——掖县抗日民主政府，并成立了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为筹集钱款保证军需供应，胶东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必须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面对当时杂币泛滥、物价飞涨的严峻经济形势，三支队领导采纳了原青岛中鲁银行经理张玉田“建立自己的银行，保家卫国”的建议，于 1938 年 12 月 1 日在地处渤海之滨的掖县成立了北海银行，并发行面值一角、二角、五角和一元的北海币。

北海银行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创办的银行，北海币市值又稳定，逐渐在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信誉。北海银行在正式营业一个多月之后，伪军刘桂堂、张宗援等率军攻打胶东，胶东区党委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被迫撤离，北

海银行随军转移。后来斗争形势急转直下，北海银行职员离散，银行业务终止。1939 年 8 月，胶东区委按照中共中央和山东分局的指示，在莱阳张格庄完成了重建北海银行的任务。

为了进一步发挥银行作用，维护根据地的金融秩序，1940 年 10 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在临沂青驼寺正式成立北海银行总行，由战工会财政处处长艾楚南兼任行长，并相继在省内各大战略区建立了胶东分行、清河分行、冀鲁边分行、渤海分行、滨海分行、鲁中南分行等。但由于各根据地处于被分割包围的态势，其时的北海银行总行与其他分行彼此独立，北海币也仅作为法币的辅币，分区独立发行，影响受限。

用市场之手排除法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强占天津、上海、香港等地的英美银行，继而将巨额法币倾销到山东根据地，借以达到换取物资、“以战养战”的目的。仅在 1942 年，流入山东根据地的法币就不下 5 亿元。一时间，根据地大量物资被廉价抢购，通货急剧膨胀。虽然通过发布政府法令对法币进行限制，但效果并不理想。1943 年的物价水平比战前高 50 至 100 倍。如何调整对法币的政策，挣脱国民党政府的掣肘，对山东根据地军政领导来说，已经刻不容缓。

1943 年年初，经济学家薛暮桥从华中前往延安途中，被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留在了山东根据地，请他协助解决北海币在货币斗争中的劣势问题。薛暮桥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要稳定根据地的市值和物价，唯一办法只有把法币完全取缔，使抗币能够独占市场。根据薛暮桥的意见，北海银行总行所在的滨海总署发出布告，决定自 7 月 21 日起

停用法币。同时，中共山东分局专门发出停用法币的指示，要求全体党员和各机关、团体、部队，必须带头执行停用法币的相关规定；号召根据地人民在北海银行把法币换为抗币或者用法币去敌占区换取物资；所有公营商店、机关和部队的生产贸易人员对外贸易所得或对外采购军需器材所需法币、伪币，必须依政府所定比率到银行兑换。

为统一领导对敌经济斗争，中共山东分局于 1943 年秋冬成立了工商管理处及各战略区的工商管理局，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一是实行“物资本位制”，保持币值稳定。与金本位制不同，北海币以物资作为基本储备。银行新发行的货币，一半交给新成立的工商局管理，用以灵活调剂物资，稳定物价。二是对货币发行量实行严格控制。山东分局明确规定各战略区货币发行数量以不超过根据地每人 30 元为标准，并多次重申要尊重供求规律，根据季节变换和战争需求灵活调控货币发行量，使北海币的发行数量与市场流通保持一定的比例。三是使用货币、贸易、生产三位一体的斗争方法，在货币斗争中支持开展减租减息和持久抗战，发展经济，活跃贸易。

以上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北海币市值不断上升。停用法币不仅阻止了法币的流入，保护了根据地的物资，而且随着法币被排除出去，我们又换进了大批物资。随着货币斗争的胜利，根据地的经济工作进入到全新发展阶段，逐渐消除了物价飞涨造成的经济危机。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北海币实现全省不分区域统一流通，货币统一的任务终于完成，极大地增强了根据地的经济实力。

参与组建中国人民银行

北海银行在没有硝烟的金融

斗争中，充分发挥活跃市场、服务战时经济的作用，不仅为山东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为解放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5 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与山东分局合并组成华东中央局。同年 12 月，华东中央局在临沂正式成立，统一领导山东和华中的全部工作，标志着山东成为华东战略区的政治军事中心。作为山东解放区经济核心机构的北海银行，在巩固好农村金融业务的基础上，按照中央要掌握城市、港口和经济重地的要求，一方面对机构进行调整，北海银行兼管各级政府金库，统一指挥，统一调度人力、财力和物力；另一方面开动机器，逐步加大北海币的发行量，为粉碎国民党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做准备。

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后，北海银行的重要任务是接收城市官僚资本银行，保持物价稳定。北海银行发行的北海币跟随华东野战军南下华东、逐鹿中原，不仅为夺取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金融保证，而且与其他各解放区的主要银行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全国货币的统一工作，为中国共产党顺利接管新解放的大中城市、占领城市金融阵地提供了宝贵经验。1948 年 10 月 5 日，山东解放区与华北解放区实现货币统一。10 月 20 日，华北解放区与西北解放区实现货币统一。11 月 15 日，山东解放区与华中解放区实现了货币统一，北海币与华中币等值流通。至此，山东、华北、西北解放区的货币均按固定比价在各解放区混合流通，为统一全国货币奠定了基础。12 月 1 日，北海银行与原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建中国人民银行，并于同日开始发行人民币。1949 年 11 月 1 日，北海银行正式改称中国人民银行山东分行，北海银行完成了历史使命。

谢维俊：“埋没”在毛泽东身边的军事人才

□ 余 慧 卢翠丹

谢维俊（1908—1935 年），湖南耒阳人。1926 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早期秘书、古田会议正式代表，是中央苏区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反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之一，参加过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对开辟和保卫中央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

忠诚革命、信念坚定。1926 年夏，在衡阳政治讲习所学习的谢维俊，就立下了投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理想，在“湘南教育王”蒋啸青的引领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谢维俊在给妻子的诗中描述道：“科学已经长成它（共产主义）的生命了”“它能安慰一切纪念他的人哟”，诗中充满了他对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

面对发展极为迅猛的革命形势，谢维俊积极投身于组织工农运动，回到家乡耒阳领导全县的工农运动。他经常走街串户，宣传共产主义和党关于农民运动的正确主张，成立了耒阳“青年工友舍”、乡农会、梭镖队等地方组织和武装力量，积极支援北伐，巩固扩大了耒阳地区的群众基础。大革命失败后，面对风雨飘摇的革命形势，谢维俊始终忠诚革命、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信心，一直在群众中秘密宣传革命终究要胜利的道理，在艰难局势下重建了肥田党支部，团结了一批党员和群众，为迎接新的斗争积蓄了革命力量。1928 年 1 月，朱德、陈毅谋划部署彬县、耒阳等

地党组织发动年关暴动时，谢维俊团结了一批勇敢机智的斗争骨干，将游击小组扩编为赤卫队，在肥田开展武装斗争，顽强抗击敌人的疯狂进攻。战斗结束后，朱德率工农革命军离开耒阳向井冈山转移。面对耒阳愈发险恶的斗争环境，谢维俊转移到乡村继续开展革命。为了巩固群众基础，谢维俊毅然决定在敌人眼皮底下召开群众大会，布置开展敌后工作、掩护大部队转移事宜。在苏区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危急情况下，他一边烧毁文件，一边还在鼓励群众坚持斗争，展现出遇事冷静、对群众负责的优秀品质。

文武双全、战功卓著。1929 年末，毛泽东主持召开古田会议，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的谢维俊作为会议代表参会，并对毛泽东提出的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重视党的思想建设等正确主张表示坚决支持。谢维俊被同志们赞誉为“一个很好的政治干部”。他在指挥战斗之余挤出时间到士兵中去，对部队中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仔细的分析、对士兵们的军事问题进行答疑解惑，很好地统一了思想、凝聚了战斗力。毛泽东曾指出军事技术只是打胜仗的条件，政治工作才是打胜仗的保证，称赞谢维俊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很不錯”。1930 年 6 月，谢维俊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受毛泽东的影响，他更加注重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

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跟随毛泽东一起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一书中就记述了他和古柏、谢维俊一起在木口村调研的过程。谢维俊对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也有着很深的理解，受到毛泽东的器重。罗坊会议后，毛泽东有一次深夜去找谢维俊，发现他正在油灯下写“我对于诱敌深入战略的几点体会”。毛泽东拿起稿子一口气读完后，表示“没想到还有一位了不起的军事人才埋没在我毛泽东身边”。

1932 年 2 月，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建立江西省军区，谢维俊调任军区工作，任政治部主任，后任江西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红军独立第五师师长，很快消灭了当地“独立勇敢队”的反动武装，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同年冬天，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谢维俊灵活运用毛泽东提出的“十六字诀”等游击战术，率部英勇作战，两次攻打崇仁县城，使乐安、宜黄、崇仁三县连成一片，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分散、牵制了敌人兵力，很好配合了红军主力在宜黄的激战，粹碎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军事进攻，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创造了良好战机。

坚持真理、勇敢不屈。谢维俊一贯拥护和执行毛泽东的正确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坚定支持者。在农村土地工作中，他反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倾

向，坚决执行毛泽东“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做法，获得了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1933 年初，由于在贯彻毛泽东正确主张、抵制王明“左”倾错误斗争中坚持真理，谢维俊与毛泽覃、邓小平、古柏一起遭到错误批判，被撤销党内外职务。但他一直秉持着共产党人坚定的原则立场和光明磊落的态度，始终以党的事业为重，在长征路上仍然拖着虚弱的身体积极工作，深入工农群众当中，宣传讲解红军政策，组织地方武装，尽心竭力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后，谢维俊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任秘书。由于红军到达陕北后，需要组建三边（靖边、安边、定边）特委以巩固后方，同年底，谢维俊被任命为首任陕北三边特委书记，与李维汉一起开展陕甘省委的筹建工作。在前往定边开辟新区的途中，部队遭到土匪突袭。面对敌人的包围，谢维俊临危不惧，指挥战士冒着大风雪与敌展开血战，最终因敌我力量悬殊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谢维俊牺牲的消息传到瓦窑堡，毛泽东大为震惊，邓小平也扼腕叹息。林伯渠 1943 年在陕北写下“谢古邓毛刘小平”的诗句，表达了对谢维俊等几位烈士的深切怀念。



矗立在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和平公园广场中心的友谊和平时天使纪念碑，是象征中俄两国友谊、祈望世界和平的不朽之作。该纪念碑于 2009 年建成，由世界四大美术学院之一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设计，纪念碑上雕像的主人公是中俄混血少女嘎丽娅，1945 年跟随苏联红军劝降芬河天长山要塞侵华日军时英勇牺牲，时年 17 岁。纪念碑高 12.08 米，主体为青铜铸造，重达 4 吨，其中嘎丽娅雕像高 3.7 米，屹立在象征山城和要塞的花岗岩基座上。碑身正面竖刻中国书法家张海题写的中文碑铭“友谊和平时天使”。基座底部右侧用中俄文镌刻俄罗斯总统普京 2007 年专门为这座纪念碑的题词：“俄中友谊就是相互理解、信任，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我们将铭记过去，展望未来。”纪念碑基座正前方四块大理石，呈“田”字型摆放，靠近碑座的两块红花岗岩方石上，分别用中俄文镌刻着碑文。外侧并列的两块黑色大理石上，则分别用中俄文镌刻着普京应绥芬河市民邀请为碑文题词的回信。碑文内容如下：

嘎丽娅·张（嘎丽娜·瓦西里耶芙娜·杜别耶娃）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八日生于绥芬河市华俄父母的平民家庭。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作为苏联红军军使翻译赴天长山要塞劝降侵华日军、解救平民而被害。为纪念她 and 所有献身民族解放的人们，永祈民族友谊与世界和平而建此碑。

绥芬河市全体市民
公元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五日

碑文简要记录了嘎丽娅挺身而出劝降日军的动人事迹，讴歌了她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作出的历史功绩。嘎丽娅如同和平天使，用自己的年轻生命和热血青春，谱写了一曲中俄联手抗击法西斯侵略、友谊长存的壮歌。敬读碑文，使我们铭记千千万万献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先烈们，传承他们舍生取义、宁死不屈的崇高精神。

牺牲在黎明前的和平天使

绥芬河地处中俄边境，两国人民来往频繁。20 世纪初，因中东铁路的修建，绥芬河成为“闯关东”“跑贼子”的重要通道。嘎丽娅的父亲张焕新是山东人，1895 年出生于山东省掖县，早年闯关东来到绥芬河。母亲菲奥克拉·列奥奇耶娃，1905 年出生于乌克兰。嘎丽娅的父母于 1922 年结婚，婚后育有四个孩子。1928 年 2 月 18 日，嘎丽娅在绥芬河出生，取俄姓名嘎丽娅·瓦西里耶芙娜·杜别耶娃，昵称嘎丽娅，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孩。1936 年，嘎丽娅开始在绥芬河苏联侨民学校学习，通识俄语、汉语、日语三种语言。

1945 年 8 月 8 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 月 9 日，盘踞在绥芬河的日寇逃到天长山要塞避难，企图作最后挣扎。8 月 15 日，苏军向天长山发起进攻。要塞日军秘密火力点大部分被摧毁，唯有天长山要塞的日军借助要塞通道屏障和以平民百姓为人质负隅顽抗、拒不投降。年仅 17 岁精通三国语言的嘎丽娅不忍无辜平民的伤亡牺牲，她主动担起劝降任务，协助苏军劝降据守在天长山要塞里的侵华日军。嘎丽娅的母亲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默默地摘下了自己崭新的红头巾戴在女儿的头上，让带有吉祥之意的俄罗斯红色头巾保佑自己年轻的女儿。苏军考虑到嘎丽娅的安全问题，决定派菲多尔琴科上尉为队长，率领苏联红军劝降小分队，随同嘎丽娅一起上山。劝降并不顺利，日军一直以未准备好或者假意投降等欺骗手段拖延时间。第二次劝降时，日军拒绝苏军前往谈判的提

不应忘却的和平天使

——绥芬河市友谊和平时天使纪念碑碑文敬读

□ 林令阳 王思淇

议，只允许嘎丽娅孤身一人前往谈判地点。出于无奈，苏军只能就近等待谈判结果。突然从谈判的小树林听到枪声，嘎丽娅很可能遇害。这时有几名日军突然对苏军开枪并打死部分苏军。日军对苏军以及嘎丽娅进行枪杀的举动，使得苏军明白了日军拒绝劝降，苏军随后决定进攻，并立即下令炮击日军驻地。而另一边，嘎丽娅的家人并不相信她已经牺牲在日军要塞中，在剿灭要塞的日军后，她的家人立即赶到天长山寻找嘎丽娅的踪迹，最终只在一棵树上找到了嘎丽娅进山时戴的那条红色头巾。此后，她的家人便再也没有找到任何与她有关的物品。她上天长山协助苏军劝降日军事件的真相也被尘封在历史中。

寻找和平天使嘎丽娅

多年来，嘎丽娅父母一直没有放弃对嘎丽娅的寻找，但始终没有任何收获，犹如石沉大海。1984 年，当时还是绥芬河市地方志编研室编辑的孙伯言，偶然浏览一份 20 世纪 60 年代的公安档案时发现了女英雄嘎丽娅被尘封数十年的悲壮故事，揭开了嘎丽娅的遇难之谜。为永远纪念嘎丽娅，绥芬河市民决定为她建造雕像和纪念碑，并致信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为纪念碑题词。2007 年 5 月，普京回信并题词。6 月，时任俄罗斯驻华大使谢尔盖·拉佐夫专程来到绥芬河转交普京亲笔签名的信件。2009 年，这座象征着中俄友谊的“友谊和平时天使”纪念碑建成并向公众开放。为了纪念嘎丽娅，2013 年 3 月，绥芬河市建立和平天使嘎丽娅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也是绥芬河市唯一一座以人名命名的纪念馆。同时为纪念嘎丽娅的事迹，绥芬河还有一条以嘎丽娅命名的路，名为嘎丽娅路。2014 年 7 月 1 日，经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黑龙江省民政厅授予嘎丽娅烈士称号。

2015 年 9 月 3 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日，在当晚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晚会演出的歌曲中，就有一首讲述绥芬河抗日女英雄嘎丽娅故事的歌曲《红纱巾》。

嘎丽娅，一个为中国解放事业英勇牺牲的少女，一个生命永远定格在 17 岁的年轻女孩，她将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她是永远的和平天使，值得中俄两国人民永远缅怀和赞颂。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